

文/修晓丽

# 我曾师从刘兰芳

## 说不好就别吃饭

1974年,我刚上中学。一天,音乐老师问我:“晓丽,鞍山要成立7.21业余艺术学校,你去不去报名?”我兴奋地问:“我可以吗?”老师说:“可以,明天我们就去参加初试……”

10多天后,我收到录取通知书:通知你校学生修晓丽明天上午9点到鞍山市歌舞团(曲艺队)学员班报到。十几个字,我看了好几遍还看不够。老师也很开心,“全市1500多名学生报考京剧、评剧、曲艺、话剧等7个学员班,才录取302人,真不容易啊!”后来我才知道,7.21业余艺校是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,也是为鞍山各个专业文艺团体储备人才的学员队。

我来到坐落在烈士山脚下的曲艺队(后来叫曲艺团),幸运地成为著名评书演员刘兰芳老师的两个弟子之一。我可是听着刘兰芳老师的《海岛女民兵》《闪闪的红星》长大的,如今竟然成为收音机里人物的学生,太高兴了。

第一天上课,我的高兴劲嗖地一下子没有了。刘兰芳老师听我讲了一段故事后,严肃地说:“你连普通话都不会说,怎么讲评书啊?”我窘迫地小声问:“什么是普通话?”刘老师说:“就是按标准发音说话。”我脸红了,“俺们在学校都这么说,老师也这么说。”看我羞得不敢抬头,刘老师缓和口气,“哦,从今天起,你要先学说普通话,说好了才可以上专业课。对了,平常说话也要讲普通话。”我连连点头。

为了学习普通话,我把日常用语的四声和逻辑重音都标好,写成小纸片攥在手里,反复练习,一旦说错,就罚自己说10遍。看我时常嘟嘟囔囔地跟自己说话,王印权老师(刘兰芳的爱人)有点担心,“这孩子太要强,别魔怔了!”刘老师却说:“不成魔,不成活!你就这样练!”我练得更起劲了。

回到学校,我遭到了同学们的讽刺,大家笑我说话拿腔作调,难听。我暗下决心:一定学好普通话,因为收音机里的人都这样!

两个月后,我的普通话有了进步,敢在刘老师面前说了,可上课的时候,刘老师表扬别人,却常批评我。我委屈,爸爸说:“丫头,玉不磨不成器,老师喜欢你才批评你的。”

就这样,我开始和刘老师学讲故事《五分钱》。一个小姑娘在电车上替老大娘买车票,弄丢了5分钱,用自己的钱赔给大娘。我要惟妙惟肖地扮演好老太太、小女孩、售票员。记得有一句“小姑娘脖子上系着一条红领巾”,我练了50多遍,总是说不好“脖子上”3个字,舌头根来不及缩回去,下一个字就跑出来了。

那天都快下午两点了,我还是讲不顺溜。刘老师说:“你说不好就别吃饭了,我陪你饿着。”我一听更难过,眼泪在眼圈里直转,还不敢哭,越紧张越说错。这时,王印权老师推门进来,“兰芳,还是让孩子先吃饭吧。”刘老师很生气,“印权,你忘了我们小时候学艺的事了?那时候说错台词挨了师傅多少打啊?不吃苦能行吗?继续练!”

终于,我一口气准确地说出了“小姑娘脖子上系着一条红领巾”这句台词,我一边笑一边哭。刘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:“晓丽,不要怪老师心狠,一个好演员就是台上一分钟,台下10年功啊……快吃饭,这是王老师给我们买的大馒头。”

## 我和老师一个待遇

半年后,真的像爸爸说的那样,7个学员班每班挑选一个学员代表,向市领导汇报演出时,刘兰芳老师推荐我为曲艺班代表。

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汇报演出《五分钱》的情景,尽管台词早就熟烂于心,但还是很紧张,尤其在大幕边条里看到刘老师坐在第一排,手里还拿着纸和笔,吓得脸都白了,我知道那是给我准备的。

在热烈的掌声中,我走下舞台,赶紧问:“刘老师,我说错多少字?”刘老师笑眯眯地说:“还可以,就错两个字,我给你记上了,回去要反复练习。”

后来我回学校汇报演出了《五分钱》,引起全校轰



动,一下子就成了“名人”。学校领导知道我每天放学连饭都吃不上,还自费跑着赶火车时,做出两项特别决定:嘱咐所有教我的老师,每天最后一节课让我提前10分钟下课;我和老师一个待遇,给我买火车和电车月票。那是多大的殊荣啊!我暗下决心,一定好好学,为母校争光!

### 我们不能眼看着空场

因为经常参加文艺活动,毕业后,我结识了鞍山市群众艺术馆的陶逸云老师,她是从部队文工团转业的,对我们业务上要求严格,生活上无微不至,每次排练她都逐字逐句地指导。她组织我们排演《张海迪故事》,到工厂、农村、部队巡演,受到一致好评!那一年我才18岁。

1991年,全省故事大赛在丹东举行,我代表鞍山艺术馆参赛。每人十几分钟的讲演让评委听得疲惫不堪。11点10分,我上台候场。陶老师说:“晓丽,你上午肯定比不上了,前面还有两个选手,她们讲完正好休息,下午评委还不疲劳。”我暗暗松了一口气,但还是按提前3个候场的要求,老老实实待在侧幕里。

报幕员介绍:“下面是抚顺选送的某某……”可是没有人上台。一会儿,报幕员又上台,“接下来的参赛选手是阜新的某某……”结果场上还是没人。这一下评委都精神了,台下的观众和演员也纷纷议论:怎么回事?演员哪儿去了?

陶老师突然明白了:那两队看参赛时间不利,躲

了。下一个就是我了。“我们也不上,走吧。”我愣在那儿没反应过来,报幕员紧接着又报出:“下面参赛的选手是鞍山艺术馆选送的修晓丽。”话音未落,伸手就往台上拽我。陶老师一看急了,“她们都跑了,凭什么让我们顶缺啊?太影响成绩。”于是反手往台下拉我。喜刷了,成拔河比赛了。

场下响起一阵笑声,我帮报幕员使劲,一边挣脱陶老师的手一边说:“陶老师,我明白您的用心良苦,可是救场如救火,我们不能眼看着空场啊。”事后我才知道,报幕员手里的话筒没关,我的话被一字不漏地传出去了……

两天的故事大赛结束了,我低着头坐在礼堂角落里参加闭幕式,想哭。平日里,陶老师像妈妈一样关心我,每次演出,她总是站在边幕帮我提词、送水。可我没听她的话,她一定很伤心。

正胡思乱想,突然听到台上宣布成绩,我得了二等奖。省文化厅领导上台讲话的第一句竟点了我的名字,“鞍山选手修晓丽那句话说得很好,相信大家都听到了——救场如救火!这就是艺德。我不仅提议她获奖,还推荐她参加全国故事大赛……”台下一片掌声。

那一次,我们载誉归来,鞍山群众艺术馆不仅获得优秀组织单位,还受到省文化厅的特别奖励,我也因此有了一个绰号:救火队员。我更加坚信,艺德很重要。

今日,我仍能大段大段地默诵出当年的演出段子。每当我在单位演讲、朗诵、演小品、写剧本,甚至当主持人、当导演的时候,我深深感激那段年少岁月的艺校生涯,感谢我的两位老师。②